

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

集刊



#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 集刊

(第四辑)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编

DA18/20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28344



上海人民出版社

1028344

责任编辑 王界云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集 刊

(第四辑)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吴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 字数 348,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

书号 11074·651 定价 2.20元

## 目 录

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	漆 侠 ( 1 )
封建小农浅析·····	孙如琦 ( 10 )
论先秦民的反抗斗争和统治者对民的理论·····	刘泽华 ( 15 )
陈胜生地阳城考辨·····	陈昌远 ( 26 )
秦末农民起义与楚文化·····	罗义俊 ( 30 )
西汉王朝初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	谢天佑 ( 39 )
论张角、张鲁、张燕之间的政治分野·····	陈生民 ( 55 )
张鲁政权性质再探讨·····	刘序琦 ( 62 )
关于李特兄弟领导流民反晋斗争性质的探讨·····	邱久荣 ( 69 )
从宇文融括户看农民阶级斗争的作用·····	李春润 ( 74 )
论黄巢渡江南征·····	王大华 ( 79 )
红袄军史事补记·····	赵佃生 ( 91 )
猛安谋克在中原的土地占有制与红袄军起义·····	乔幼梅 ( 94 )
明中叶荆襄地区流民的垦荒斗争·····	黄国强 ( 103 )
明代宦官与明代农民起义·····	杜婉言 ( 109 )
明代广西大藤峡农民起义·····	徐硕如 ( 122 )
李自成襄阳政权若干史实考辨·····	顾 诚 ( 133 )
试析李自成农民军后期的主要作战形式·····	吴如嵩 ( 138 )
论山海关之战·····	孙达人 ( 144 )
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汉口镇的发展·····	范植清 ( 156 )
叶廷秀之死·····	崔 介 ( 164 )
于七事迹述略·····	王思治 ( 165 )
从苏四十三起义看教派斗争的阶级实质·····	张捷夫 ( 168 )
太平军初期战略指挥及其演变之考察·····	崔之清 ( 174 )
王伦起义史料辑(上)·····	俞海兰 ( 184 )

# 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

漆 侠

中国农民战争史是建国以来新兴的一门学科。三十多年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门学科从无到有，从萌生到茁壮成长，获得了非常显著的发展。回顾这门学科所经历的道路，较其短长，论其得失，对它的继续前进不是没有益处的。

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即：从建国到一九五八年，为开创阶段；从一九五八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为有关基本理论的探讨阶段；从粉碎“四人帮”到今天，为走向纵深发展的阶段。下面便按照这个顺序加以叙述。错谬之处，请予匡正。

## 一、从建国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创阶段

自从一九三九年底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表以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便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开始了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他们或者以专题论文的形式，或者在自己的著作中以一定的篇章，描述了农民革命的一些英雄事迹。其中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著名的论文，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论述了明末李自成起义军之从胜利到失败，总结了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将永远为革命人民所铭记。

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在解放后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的。正象旧政治旧经济之必须得到彻底改造一样，包括旧史学在内的

旧文化学术思想也必须得到彻底改造，才能够适应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需要。究竟谁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同一切剥削阶级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分歧。一切剥削阶级的史学认为：只有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才是历史的主人，他们秉承了上天的旨意，“作之君”，“作之师”，以君临天下，统治人民的；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广大的劳动人民，即真正的历史命运的主宰者和决定者，却被看作无知的群氓，注定地、世世代代地充当剥削阶级的马牛，即使连他们自己的生存权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的时候，也不能够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这种被颠倒了的社会历史，终于被马克思列宁主义颠倒了过来。斯大林说得好：

“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sup>①</sup>

中国农民战争史这门学科，就是为适应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以及在对旧史学的改造中诞生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从其开始就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所开辟的道路奋勇前进的。

在从建国到一九五八年的开创阶段中，中国农民战争史主要是以针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为研究的内容为特点的。报刊上不但发表

<sup>①</sup>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第647页。

了许多篇论文，而且汇集成册的还有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农民起义论集》，赵俪生、高昭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孙祚民的《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等著作，以及郑天挺主编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等等。上自陈胜吴广起义，下至义和团和民国初年的农民起义，无不涉及，研究面是铺开了。概括这一阶段的研究，大致获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首先，经过作者们对于零散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于新史料的钩沉、考索、抉发，使我们对于秦汉以来的几次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和一些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象黄巢领导下的唐末农民战争，他们游动的路线是很杂乱的，现在经过整理，便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至于象陈胜、吴广北上进军的路线，隋末翟让起义的年份，窦建德同河北人民的深厚关系，宋江是否征过方腊，以及李自成殉难的确切地点等问题，无不经过订正考补，给以确实的说明。对于一些湮没无闻的起义事迹，诸如明中叶荆襄山区刘通、李原领导的流民起义，刘六、刘七在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起义，也都经过考证补苴而再现了它的原貌。对农民战争史实的探索，是这一阶段研究中取得的重要成就，为尔后的研究奠立了一个初步基础。

其次，对于每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爆发的时代背景和原因，或者说，对于造成起义的社会矛盾，许多论文也都作了一定的分析。一般说来，对于封建统治的残暴和当权者集团的腐朽这一直接促使起义爆发的原因，揭露得是相当充分的。对于各个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特别是土地集中的问题、赋役制度的问题，也有所论述，从而初步地接触到：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诸关系，同农民起义的爆发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外，有的论文还能依据具体材料进行分析，阐明了某次农民起义之所以在特定地区爆发的原因。季鏗（即汪篪）有

关隋末起义爆发在山东的论述，就是这一类型的文章。这一类的研究，给人们以这样一种认识：农民战争的爆发，在一般的普遍的原因之中，有其独自的特殊的原因，从而使每次农民战争都具有自己的特殊面貌。因此，开展这一类的研究，对于阐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时代特征，是极其重要的。

对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之如何推动社会前进从而成为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问题，也是本阶段研究中尽力探索的。一些论文以比较丰富的资料，论证了这个问题的侧面。如唐太宗对农民的“让步”思想，唐初赋役的相对减轻和均田制较为广泛地推行，以及由此而来的大唐帝国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同隋末农民战争有血肉相联的关系。又如明太祖对官僚豪势的抑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以及明初土地垦辟的激增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同元末农民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论述与历史实际大致是符合的，因而也是可以肯定下来的。对于被地主统治阶级镇压下去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唐末农民战争，也都有所论述。有的论文曾把五代十国经济发展的若干现象，径直地与唐末农民战争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唐末农民战争推动作用的具体表现。这类见解能否成为确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检验，但作为尝试来看，显然是值得重视和提倡的。这是由于，任何学科，不经过尝试，是发现不了新的问题的。

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本阶段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研究的范围尽管相当广泛，大多限于对农民战争的局部的、片段过程的论述，而对农民战争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还没有勾勒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有的依然是历史的空白点。象对于秦末农民战争这一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就缺少较为完整的论述。对于历史资料是如此丰富的明末农民战争，不但缺乏全面、深刻的叙述，而且还

缺乏对张献忠义军的论述。固然张献忠个人及所部活动有不少弱点缺陷，这是起义农民内部的问题，而无耻的封建文人横加于这支义军的诬蔑那就更多了，而这些则是应该早日加以澄清的。张献忠义军活动有许多特点，游踪不定、飘忽无常的军事行动便是其中之一；在某些年份内，李自成义军销声匿迹，这支义军是当时反封建的中流砥柱；在推翻明朝统治中，它也曾立有不可磨灭的功勋。因而在农民战争史上，这支义军应该占有足够的篇章。总之，只有在填补了若干的历史空白，较全面地论述历次农民战争的基础上，才可能写出一部首尾贯串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这是亟待努力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的研究限于局部、片断问题的探讨，没有能够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即把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意识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考察，因此，也就难以探寻某一次或几次的农民战争的时代特征和规律。这样一来，在某些方面就变成对历史现象的浮光掠影的表述，从而给人们以公式化、千篇一律的感觉。于是，土地集中，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爆发了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统治者对农民让步，经济得到了发展；土地又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又残酷剥削、压迫了，于是又爆发了农民起义……。人们只能从这种形式的论述中看到历史的循环，而看不出这次起义同那次起义到底有什么区别，更看不出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究竟从哪里才体现出来！

万事开头难。中国农民战争史这门学科刚刚诞生，在对理论的运用以及在理论同史料的结合上，不可避免地表现了它的幼稚性和不成熟性，因而不能对这一阶段的研究过分苛求。不论怎样说，这门新的学科毕竟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在它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是一定能够克服它的种种弱点，提高它的科学水平的。

## 二、从一九五八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理论问题的探讨阶段

本阶段的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在刊印了许多篇论文和《秦汉农民战争史》、《秦末农民战争》等专著，以及史绍宾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何竹淇《两宋农民起义资料汇编》等资料书的同时，对农民战争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热烈的讨论，从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使本阶段的研究具有它自己的特色。之所以从具体问题转入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乃是因为：第一，人们的认识总是从个别而后上升到一般，前一阶段有关农民战争具体问题的研究，必然要上升到对它的规律性的认识，因而也就需要从理论的高度来探讨这些问题；第二，在上一阶段的研究中，对农民起义领袖人物如项羽、李密等的评价，对农民战争之向封建统一战争的转化等许多问题，都存在不小的分歧，而这些分歧也只有通过理论上的探讨才能解决；第三，在五八年全国性的评价曹操问题之时，已经提出了对封建时代农民战争如何认识、如何估计的问题，这样，也就以此为契机，从五八年以后极其自然地展开了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了。

本阶段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六、七年间，不仅在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中间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连老一代的史学家也卷入了这场争论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探讨最先是老一代史学家引导出来的。探讨的范围虽然极其广泛，但集中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大约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早在五十年代，有的文章就一再强调农民起义曾顽强地同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进行了战斗，可是没有同封建制度进行战斗。

到六十年代,这种见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农民起义总是把自己的指责归之于个别官吏、个别皇帝以至个别王朝,却不曾指向那个制度(指封建制度)、那个阶级(指地主阶级)。翦老把这一见解高度概括为:农民反对地主,从来没有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封建,从来没有把封建作为一种制度来反对。

第二种意见是,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农民起义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和意义,只是到了隋唐以后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农民起义才具有了反封建的性质和意义。五八年郭老在他的《蔡文姬》剧本的序言中曾经提出这一看法,后经其他同志补充,成为有别于上一意见的新的见解和看法。

第三种意见是在六十年代初提出来的,这一意见认为,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自始至终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无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提出或者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亦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无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打击的矛头指向皇帝、贵族、地主老爷等个别的人,或者指向封建国家、封建制度的某些环节,亦都具有反封建性质。这是因为,封建社会是具有对抗性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从其奴隶制母体中即孕育了这种对抗性,到封建制形成之后,这种对抗性即逐步发展成熟,从而表现为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如果认为农民起义不反封建,那就等于取消了封建制所固有的内在的对抗性质;如果认为下行阶段才反封建,就易于把自己的论点与外因论混同起来。

关于农民战争性质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既然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产生如此重大的分歧,所以在下面的一系列的问题上,也就派生出来种种的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农民阶级阶级性的问题。

为什么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不反封建呢?

持这一看法的同志从农民阶级的阶级性方面作出回答。他们认为,农民阶级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阶级;在平时,农民阶级的现实愿望,就是地主阶级减轻剥削和压迫,使农民们还能活下去,活得稍好些;农民所追求和向往的则是发家致富,使自己成为地主,或者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取得利禄,“耀祖光宗”。在农民战争胜利发展的年代里,起义农民领袖所追求和向往的,就是推翻腐朽的旧王朝,而由自己充当“好皇帝”,建立“好王朝”,实行“好政治”。由于农民阶级处于这一特殊的阶级地位,“力求使自己成为那个侥幸的个人(即成为地主),成为那个极少数”,“这些情形也就反过来更加障碍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视野,更加帮助了封建统治的绵延”。

持农民战争自始至终具有反封建性质这一意见的同志,则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虽然具有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特性,但由于它自始至终地受到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同封建主处于对立的地位;它总是力图打破现状,摆脱封建主的奴役和压迫,发展自己的私有经济,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在小生产的局限和地主阶级的影响下,农民阶级又有了不少落后的思想。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说来,决定它的阶级面貌的,是这个阶级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先进的反封建的革命方面,而不是它的落后方面。在平时,广大农民作为劳动生产者阶级,总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解决衣食问题,并由此过得稍好些,绝不是坐在那里幻想地主阶级减轻一些剥削,更不是飘飘然于想当地主、想当官员,“耀祖光宗”;在战时,则是希望推翻封建统治,解除地主阶级的压迫。不错,农民有自己的经济,是小私有者,但绝不能够把农民的小私有性与地主的封建性等同起来,把农民的小私有经济与封建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泯灭这两者之间的质的差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抗关系。即使对于具有浓重封建

思想的农民上层,也不能因为他们想当地主、想升官发财而与封建地主阶级等同起来。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农民起义的自发性问题。

持农民战争不反封建这种意见的同志,还从自发性上回答这个问题。农民起义之所以把自己的指责归之于个别官吏、个别皇帝以至个别王朝,乃是由于农民不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农民起义不是自觉的而是自发的。支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还认为:起义农民看不出这种生产关系(指封建生产关系)有什么不正常之处,因而他们的自发斗争没有同封建制度进行战斗。这些论述进一步阐述了农民起义之既没有反对地主阶级也没有反对封建制度。

另外一些同志则不同意这一意见。他们认为,自发和自觉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尽管农民阶级在主观认识上达不到如同无产阶级对封建制度的科学认识,但在客观实践上,农民阶级的起义、斗争,既反对了地主阶级也反对了封建制度。任何一个农民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同地主老财的利益是对立的,地主老财是剥削他们的,否则就不会产生抗租不交之类的行动。农民战争之所以是自发的,并不是由于农民不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是因为,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找不到用什么办法战胜地主阶级,用什么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如果认为农民起义的自发性质不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制度,那末,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是否还存在阶级斗争?

第四个问题的分歧是:在农民战争过程中,起义农民是以封建思想、封建纪纲作为指导呢,还是以农民所固有的反封建剥削压迫的思想作指导?

有的同志认为,封建社会里的农民处于愚昧落后的状态,没有自己的阶级思想意识;他们可以拿起锄头作为反抗地主统治的物质的武器,却没有反抗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无法摆脱地主阶级的思想支配。因此,秦朝以

来的历次农民起义只是以封建的纪纲、封建的理论来反抗封建的统治;起义农民的领袖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有的同志为这一意见加以补充说,起义农民虽然能够起来英勇地反抗封建统治,但还不可能具有明确的反对地主和封建制度的理论思想活动,亦即“没有反抗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

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一个阶级的思想意识,是由存在着的这个阶级所决定;有多少阶级,也就有多少阶级的思想意识。农民阶级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客观存在,因而也就有农民阶级的思想意识,这是无法否定和取消的。在农民战争过程中,起义农民是用它自己的思想、理论为指导,进行反封建的斗争的。通过大量的、经常性的斗争实践,特别是通过狂风暴雨般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起义农民在血的经验积累中,概括和提炼出了自己的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这个思想就是宋代农民起义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到太平天国革命时的天朝田亩制度而发展到极峰。千多年来农民的这个革命思想,象一根红线一样贯串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中。

上述两种对立的意见,概括为两种思想,一是农民具有皇权主义思想,一是农民的思想属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从而构成第五个分歧。

对于皇权主义,也有不同的看法。翦老认为,皇权主义是对皇帝制度的确认和对皇帝制度的升华。显而易见,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有的同志认为,皇权主义分为地主阶级的皇权主义和农民阶级的皇权主义。有的同志认为,皇权主义产生于小生产者的家长制。有的同志认为,皇权主义既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就只能产生在封建经济制度和封建家长制这个基础上。

认为起义农民没有自己的思想,而只能以封建纪纲、封建理论为指导这一看法的同志,在列举秦汉以来农民起义过程中称帝称

王的现象之后，强调指出，起义农民具有皇权主义思想，是所谓的皇权主义者。

同上述意见相反，有的同志认为，皇权主义既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因而对起义农民说，只能是来自外部的地主阶级思想的影响，而不是农民阶级的本质。农民的思想，如上所述，是“等贵贱，均贫富”。这种思想，在政治上，反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要求消灭封建等级特权，使农民获得平等权力；在经济上，要求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这种思想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特点，但它要求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国，同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体系相对立，因而它构成为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或者象有的同志所说，从属于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政权问题。在农民战争过程中，起义农民能否建立政权？所建立的政权是封建性政权、封建政权，还是农民政权？同样存在重大的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起义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政权或封建政权。这是因为，农民起义领袖往往以封建纪纲、封建理论为指导思想，在起义过程中称帝称王称将军，或者如钟相称天大圣，起义军所建立的一套机构，无一不是按照封建政权的规模，甚至所用的一套礼仪，也都是从地主阶级那里照抄照搬。不但刘邦、朱元璋所建立的政权，从其开始就是封建性政权或封建政权，而且钟相、杨么所建立的政权也是封建性政权或封建政权。

第二种意见认为，起义农民在反封建斗争过程中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农民政权，这个政权是镇压地主阶级、维护农民阶级利益的权力机关。但这种政权是短暂的，在战争中或战争后被贵族地主分子利用了去，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刘邦所建的汉朝、朱元璋所建的明朝，都是从农民政权蜕化变质而成的封建政权。

第三种意见则为第二种意见的补充。农

民战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农民政权，有它的特殊性，即：以皇权主义为形式，而以革命民主主义为实质。起义农民在当时条件下，找不到其他的政权形式，而只能照抄照搬封建政权那一套，所以它具有皇权主义形式。但在这个政权中起作用的则是农民的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钟相、杨么就是以这个革命武器，把封建统治的“国法”称作“邪法”而弃置一旁的，并以“劫财”作为“均平”财富的手段，没收了地主的浮财和土地，同时还消灭了各种牌号的地方封建势力，起义农民从被压迫的地位转变到统治地位，倒转了乾坤，与南宋统治形成为两个对立的世界。随着农民战争的顺利发展，这个政权或因农民出身的领导者被封建思想腐蚀，或被贵族地主分子窃据，或因降官降将增加而使封建势力居主导地位等等，它的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日益泯灭，而皇权主义所固有的封建性则因此而越来越占上风。在这样的条件下，它会逐步地蜕化变质成为封建性政权或封建政权。认为起义农民一开始建立的政权就是封建性政权或封建政权，那末，起义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不成了“封建性政权”或“封建政权”同“封建政权”进行斗争了吗？在封建社会里，是否还存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或农民的阶级斗争？这就又回到第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去了。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让步”政策和反攻倒算的问题。

从五十年代初，论述农民战争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统治，迫使封建地主阶级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从而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种政策，就是所说的“让步”政策。六十年代，翦老对这种“让步”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在农民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是否“让步”，“让”不“让”，或者“让”多少，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的同志还曾提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这一公式，来说

明农民战争的这个作用，是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的。也有的同志认为，只有透过“让步”政策，才能说明农民战争的作用。

六五年秋后，有的同志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认为在农民战争后，从来没有什么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而只有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地主阶级在农民战争火炽之时尚且不肯“让步”，更何况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怎么能够实行“让步”政策呢？在农民战争后，地主阶级重新夺回了农民夺去的土地，重新给农民套上封建枷锁，自古至今，所有反动统治阶级在镇压了劳动人民的反抗之后，都只有反攻倒算，所谓“轻徭薄赋”不过是历史的骗局。只有转入山林的起义农民，摆脱了封建奴役的枷锁，垦辟了荒田，才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另一方面，地主阶级虽然实行反攻倒算，但它不可能全部倒算回去，这样，在农民战争后表现了历史的发展。

当然在这一阶段中不限于上述理论的探讨，对农民战争之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阶段性等问题，也都提出来讨论。从上述问题的讨论情况来看，有些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很可能变成“天方夜谭”式的争论，要经过几个一千零一夜或十数个一千零一夜，才有可能得到一致的看法。虽然如此，本阶段的讨论，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它不仅交流了不同的看法，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在坚持自己的观点、看法的同时，了解或吸取对方的某些观点、看法，取长补短，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为写出不同观点、看法的农民战争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一点是极其宝贵的，值得重视的。

在本阶段的探讨中，曾经发生了偏向，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一种偏向是对农民起义过分地“拔高”。他们认为，农民阶级可以不经先进阶级的领导，就能够推翻封建制度，使自己从封建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还认为，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并不是

为了发展农民自己的小经济。这种脱离了阶级利益而侈谈所谓的阶级斗争，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客观的实际的阶级斗争。这些同志振振有词，以批判者自居，但是他们却不曾料想到，这些论谈使自己不自觉地陷入“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空话之中。另一种偏向则是恣意贬低农民战争、贬低农民阶级，把农民看成为准地主、半地主，抹杀农民阶级的存在。而这种偏向，较之第一种偏向更加严重。因为前者找不出任何的事实依据，空喊一通而已。而后者不仅能从历史材料找出一点适合自己口味的东西，同时也有一定的市场传播这类看法。这两种偏向都是应当纠正的。

### 三、从粉碎“四人帮”到今天： 向纵深发展阶段

自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欣欣向荣，无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断了十多年之久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也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与会同志愤怒批判了“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交换了研究这门学科的各种意见，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几年来，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组织下，在成都、西安召开了年会，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这个刊物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些同志编辑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几年以来报刊上发表了大批的有关农民战争史方面的论文，其中有不少非常出色的和有分量的文章。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开始走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首先是，开拓了研究领域，弥补了前此研究中的空白和不足。如顾诚有关明末农民

起义的几篇论文,诸如李岩这个人物的有无,大顺政权的性质,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力作,影响所及,远被异域;对《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再评论,也给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有力的批驳。胡昭曦的《“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一文,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文人对张献忠义军的种种诬蔑,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诸葛计探索唐末农民战争军事活动的论文,也是别开生面。还有许多好文章,这里无法一一介绍。

其次是近年的研究,逐步地同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结合起来,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中去,阐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农民战争口号、纲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封建统治阶级经济政策的变化中,考察农民战争的作用,等等。这虽然是刚刚开端,但它却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大家知道,社会生产力或广大劳动生产者,只有通过农民战争的形式,或是直接地提出,或是采用其他办法预示它在各方面的首先是经济方面的要求;而社会经济关系往往经过一次或若干次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之,农民战争和封建社会经济关系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艰苦的认真的研究和探索,就一定能够对两者的某些规律性的联系有所了解 and 认识,这是可以预卜的。

第三,在近年的研究中,还先后出版了谢天佑、简修炜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简史》、田昌五的《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一卷)、孙达人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胡如雷的《唐末农民战争》、袁庭栋的《张献忠传》和白钢、向祥海的《钟相杨么起义始末》等专著。这是极为值得注意的一批成果。除《简史》外,前两部是对秦汉时期农民战争的论述,后三部是对一个断代的或某一次的农民战争的论述。这些专著都是在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都表现了它自己的特色。前面曾经提到,六十年代有关理论

问题的探讨,将为写出不同观点、看法的农民战争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句话在现阶段兑现了。如孙达人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就是贯彻了他的反攻倒算这一观点、看法的著作。《唐末农民战争》在叙述方法上,别开生面,使人耳目为之一新。从上述这些成果来看,显然是开创阶段、探讨阶段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如果没有前两个阶段,特别是理论问题的探讨阶段,也不可能产生这些成果,使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实际上,这几年来有关理论方面的探讨,也是斐然可观的。下面侧重谈谈动力问题和平均主义问题的探讨。

先说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对这个问题,大约有以下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生产力是根本动力。持这一意见的同志,有的认为阶级斗争如农民战争,不但不是动力,而且对社会生产力还起着破坏作用。第二种意见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的真正动力,而是与革命战争、生产斗争和国家政策措施这三者并列,同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第三种意见认为,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都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只有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中即为农民战争)才是真正的动力。第四种意见则认为,贯串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运动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直接表现为阶级斗争,因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便成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或唯一动力。

从这个讨论中,可以看出,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割裂并对立起来这种片面性是相当严重的。要么就是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而否定阶级斗争的作用;要么就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农民战争的作用,而贬低生产力的作用。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构成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人,即劳动者,这是生

产力的主体，或者说体现者；在阶级斗争中，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者，则是进行这一斗争的主力军，这两者是一致的。只有把一定社会阶段的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统一起来，才能阐明劳动生产者的真正动力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历史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劳动者创造的，这是从社会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只有认真研究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才能解决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再谈关于平均主义问题的探讨。

有的意见认为，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过程中只能起着“破”的功用，到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时，其害处比封建主义更甚；农民战争是由于实行平均主义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搞封建主义是唯一的出路；农民战争对封建社会起着“修理工”的修补作用等等。许多同志则不赞成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平均主义是革命农民反封建的“本能”表现，它要求平均封建土地和封建地主阶级所攫占的社会财富，是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平均主义虽然是一种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但它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在当时并不是空想。称“平均主义”是反动的，指的是它想绕过资本主义、建立农业社会主义而言的。导致农民战争失败的，并不是平均主义，军事力量是一个因素，而农民起义领袖的封建主义化也是一个因素。朱元璋就是封建主义化的一例。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在上一阶段争论过的一些问题如农民战争的自发性、政权性质、皇权主义也都重又提出来了。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有许多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例如有这样一种意见：“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实际内容和归宿上并非同封建主义根本对立，而是在实质上相通的。”平均主义是农民的思想，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一个要均平封建主的地和财，一

个要兼并农民的地并进而奴役其人，这两者正好在根本上对立，在实质上有什么相通之处呢？不错，农民有自己的小私有经济，但它是被剥削的；而封建主的经济是封建私有，是压榨农民的血汗而凝聚起来的。如果都因其私有而认为实质上相通，这不是正象前面所说的，从泯灭大小私有之间的区别，进而泯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区别吗？至于把平均主义看得比封建主义还坏，那就更加悖谬了。

在这几年的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偏向是，以纠正过去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拔高”现象为借口，对农民战争大肆挞伐，恣意“贬低”。这种“贬低”的偏向几乎形成一种思潮。有的文章在纠过去的“拔高”偏向中，把与自己见解不同的看法，一概斥之为公式主义、教条主义，而只有他自己的看法才真正具有“创造性”！一会说农民起义只有破坏性，一会又说农民起义是封建制度的“修理工”。于是乎封建制度在农民战争的推动下而成为“永恒正义”！同时又说，平均主义比封建主义还坏，农民起义领袖只有搞封建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乎封建主义成为了农民革命的灵丹妙药！而这类“创造性”的见解，博得某些外国资产阶级的赞赏和喝彩，也就不言而喻了。

建国三十年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证明：沿着马克思主义航向，这个研究就会取得很大的成绩；偏离这个航向，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让我们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继续深入发展。

〔附记〕本文仅是作者个人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点看法，不妥之处，请予纠正。第一部分根据作者五六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文章，进行了压缩；第二部分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谈过，附志于此。

# 封建小农浅析

孙如琦

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经过艰难曲折，目前渐趋深入。不少同志鉴于过去的研究存在就农民战争谈农民战争的弱点，力图把农民战争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诸如探讨农民战争与封建经济的关系等等，正是这种努力的反映，这将使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同时，从众多问题的不同意见看来，分歧往往与对农民阶级的认识不一致相关联。由于各种主观原因，人们或强调其进步性，或夸大其落后性，从而不能正确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的本来面目。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本身状况的研究。本文试就怎样认识封建小农，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 一、封建小农个体经济的特点

我国的封建小农脱胎自奴隶社会，其中大部分由奴隶制下的村社成员演化而来。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奴隶反抗斗争的发展，井田制日益破坏，农村公社逐渐瓦解，土地从公社占有在村社成员中定期分配的“三年一换土易居”<sup>①</sup>，变为由村社成员占有的“三年更耕之，自爱其处”<sup>②</sup>。这种掌握有小块土地的村社成员，在封建制形成过程中遂成为封建小农。此外，尚有由平民转化或由奴隶上升而来的。同时在社会大动荡时期，奴隶主贵族中也有人下降为农民，《国语·晋语》所比喻的“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指的正是这种变动。

封建小农是从事农业的个体劳动者，有自己的个体经济。但是封建小农又对地主或封建政权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从而遭受超经济强制的剥削。封建小农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时间、地区的不同，其程度有所差异，而在整个封建社会的趋向则是一个先加强、后减弱的过程。从东汉起，依附关系逐渐加强，大地主田庄中的徒附和宾客，名义上虽仍是政府编民，实际上隶属于私家。曹魏的“给客制”和东吴的“复客制”部分地承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西晋实行“荫户制”，封建政府以法令形式，使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完全合法化。这种状况直至唐朝后期才开始有所变化。自宋以后，随着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和土地所有权转换的加速，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也相应减弱，后来虽还有曲折，但总的趋势是朝着日益松弛的方向发展的。

从横的方面看，封建小农包括自耕农、依附农、佃农等不同阶层。封建小农各阶层的人数比例，因缺乏定量材料无法作出估计。大体上说，在封建社会前期自耕农较多，而后期则佃农数量明显增加。从社会舆论的变化可见一斑。战国时李悝曾估算了“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的小农一年收支入不敷出的情况。此后，这种一家五口的自耕农，长期是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西汉晁错的《论贵粟疏》想用提倡贵粟的方法，以防止自耕农“卖

①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② 《汉书》卷24《食货志》。

田宅鬻子孙”<sup>①</sup>。东晋王羲之致书谢安，建议用罪犯充役，以避免自耕农因徭役太重而逃亡<sup>②</sup>。两宋以后，虽然仍注意自耕农，如吕大钧针对“主户之田少者（主要指自耕农），往往自卖其田以依有力之家”，提出“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sup>③</sup>，也是为了稳定自耕农。但引起更多注意的是佃农，如方回在《续古今考》中，分析南宋小农情况时说：一农可耕今田三十亩，假如亩收米三石或二石，姑以二石为中，亩以一石还主家，纳主三十石，佃户自得三十石，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有十二石之余<sup>④</sup>。所叙述的就不是自耕农而是佃农的情况。此外，宋人文集中议论如何笼络、控制佃农的记载也屡有所见，王岩叟所说：“富民召客为佃户，每岁未收获间，借贷赙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至他”<sup>⑤</sup>，颇具代表性。

尽管封建小农在各发展阶段的人身依附关系强弱不同，各阶层的经济地位也互有差别，但是他们的个体经济在生产结构上都具有明显的共同性，那就是极其简单，一家一户、男耕女织，既是自然人口单位，同时又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只要掌握必备生产工具的劳动者和土地相结合，那么不管这小块土地是属于地主还是属于小农本人，都可以组织起简单的生产。这种自足自给的小生产单位，既再生产物质财富，又再生产人类自身。由于它十分简单，所以很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极易被破坏。另一方面，正因为它简单，在遭受破坏之后又很容易恢复。因而从总体上看，封建小农的个体经济非常顽强，始终与封建社会共存。

但是，如果从封建小农的个别成员看，则他们的个体经济又很不稳固，特别是自耕农，除极个别的上升为地主外，绝大多数经常因遭受繁苛的赋税差徭盘剥及天灾疾病的袭击而破产。自耕农破产之后的结局，在封建社会不同阶段各有差别。封建社会前期，

因奴隶制残余存在，失去土地的农民除大量成为流民、依附民外，有不少沦落为奴隶，西汉末年土地与奴婢成为两大社会问题，就是明证。后期则多数沦为佃农，也有成为雇农的。佃农如若破产，其境况当然更为悲惨。

封建小农个体经济这种又稳固又不稳固的特点，是我们正确认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基本依据和探讨农民战争的重要出发点。

## 二、封建小农的阶级特性

封建小农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必然具有本能的革命要求。同时，由于他们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所以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革命性与保守、落后性的对立统一，构成为封建小农的阶级特性。史学界对于封建小农的这种阶级特性是一致公认的。只是在具体分析时，有人夸大其革命性，认为他们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有人夸大其保守、落后性，说他们只追求富贵，甚至想当地主。或一个时期偏重突出革命性，一个时期偏重突出保守、落后性，至今仍分歧颇多。

夸大其保守性的同志，大多引用马克思分析法国小农那段话作为理论依据：“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sup>⑥</sup>其实引这段话来说农民都是保守的，与马克思的原意有距离，因为紧接上文，马克思就希望别人不要误解他的话，他说：“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

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晋书》卷80《王羲之》。

③ 《宋文鉴》卷106，吕大钧《民议》。

④ 《续古今考》卷17《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13之21。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保守的农民”，“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sup>①</sup>很明显，马克思认为拥护波拿巴王朝的是保守的农民或农民的保守方面，而不是全部农民或农民的革命方面。历史事实是，在波拿巴政变前后，尤其是政变之后，法国农民对他相当不满，将近二十个地区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有的地方还发生激烈交战，比较有名的起义地区为：蒙太尔吉、克拉姆西、拉帕利斯、波利涅、菲热克、维尔诺夫、锡斯特龙、迪涅、马尔兰德、布里尼奥、福卡尔克、贝齐埃尔等等。<sup>②</sup>

夸大其革命性的同志，通常作为理论根据的是，列宁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指出农民要求土地全民所有的思想“带有革命民主主义性质”<sup>③</sup>，在《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提到的“农民的革命民主派”<sup>④</sup>，以及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等论断。经典作家这些论断所指的均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农民的地位和作用，把这些论断套用到封建社会瓦解前的小农身上是不很恰当的<sup>⑤</sup>。

总之，不完全确切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语录以强调封建小农的保守、落后性或革命性，都不足以令人信服。事实上，他们的革命性与保守、落后性是交错在一起的，只能具体分析某一时期革命性突出还是保守性突出。通常情况下，平时总是保守性重些，因为封建小农散居各地，世代相传，习于顺从，非到万不得已，总会忍受加在他们头上的一切苦难。当然，也不是完全逆来顺受，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他们逃亡、抢粮、抗租、退佃等等斗争也时有发生。而在起义期间革命性明显增强，一旦封建小农被迫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就会抛弃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义无反顾地英勇斗争，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动地

的战歌。但是，在斗争过程中又不时暴露出保守落后的弱点。

至于造成封建小农既有革命性又有保守落后性的原因，不少同志把列宁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小农因为是劳动者所以拥护社会主义，因为是小私有者所以倾向资本主义的分析，套用到封建社会的农民身上，提出封建小农是劳动者所以有革命性，又是小私有者所以有保守落后性，这是不妥当的。历史上从未存在过抽象的劳动者或抽象的小私有者。从封建小农的具体情况看，劳动者身份和小私有者身份密不可分，他们是拥有小私有的劳动者，或者说是从事劳动的小私有者，革命性与保守落后性均从此产生。封建小农的革命性不仅与他们的劳动者身份有关，也与他们的小私有者身份有关。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农民维护自己的小私有者身份不仅不是保守，反而是进步的。因为小农是封建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他们个体经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和经济的盛衰。如果能争取到较好的生存条件，在维持最低生活后尚有结余，他们就会用以扩大再生产或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所以，每当个体小农经济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总是出现社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局面，汉唐盛世形成的原因即在此。反之，当地主阶级及其政权敲骨吸髓的剥削超越小农所能承受的负担时，他们便丧失生产能力，使社会再生产无法继续，社会经济便迅速残破。农民群众不能忍受这种处境，他们不愿无谓地死去，于是奋起抗争。陈胜曾经说过：“苟富贵，毋相忘。”以后农民起义领袖提出的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4页。

② 迪比《法国农村史》第3卷第174页，1976年法文版。此材料由杭大法国史研究室楼均信同志提供。

③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52页。

④ 同上书，第381页。

⑤ 关于经典作家这些论述指的是近代农民，请参看李振宏：《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载《文史哲》1980年1期。

号，如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的“均田免粮”等等，都包含着农民维护、恢复、甚至发展小私有的要求在内。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能说这种反对地主大私有，保障农民小私有的要求不是革命而是保守的吗？

既然封建小农的保守落后性并不是简单地植根于小私有，那么它来自哪里？确切地说，应该来自生产的个体性。封建小农从事个体生产，他们基本上自给自足，彼此分散，互不交往，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保守、落后的弱点。封建小农的这些弱点，在中国封建社会频繁发生的农民起义中，曾表现得非常充分。

### 三、封建小农的思想意识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sup>①</sup>有人据此认为农民阶级没有自己的思想武器，这是不对的。因为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只是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并未否定被统治者有自己的思想，不占统治地位不等于没有，这是显而易见的。况且历史一再表明，只要有剥削存在，就会在被剥削者中间自发地产生与这一制度敌对的思想。

封建小农的思想武器究竟是什么，是皇权主义还是平均主义，史学界争论已久。细观封建社会农民的实际，应该承认这两者都是农民自己的思想，它们是两朵从封建小农个体经济土壤里产生出来的并蒂花。皇权主义是小农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平均主义则是在经济上的表现。

主张皇权主义是封建小农自己的思想，

与当前多数同志的见解不一。在讨论皇权主义的阶级特性时，一般认为它是地主阶级思想，有人甚至进而引伸为就是封建专制主义，这种见解似缺乏说服力。皇权主义最早由斯大林明确提出，他在谈到俄国农民战争时，指出拉辛和普加乔夫等农民领袖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sup>②</sup>。

“反对地主”，含义十分明确，当然不会是地主阶级的思想，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农民拥护“好皇帝”。农民的皇权主义和地主阶级的皇权思想是有区别的。封建小农由于个体经济的分散性和经常处于行政权力支配下的习惯性，需要有人代表自己的利益，这个人就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好皇帝”，也即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农民皇帝”。从德、法、俄三国来看，拥护“好皇帝”是农民战争中普遍的现象。其具体内容虽各不相同，但有一致之点，即在拥护皇帝的背后，隐藏着农民阶级自身的利益。德国农民起义曾提出除皇帝而外要消灭其他一切统治者。他们拥护皇帝，是把皇帝作为统一的象征，希望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德意志国家。法国1607年维瓦莱省的起义农民也高呼“国王万岁”的口号，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俄国三次农民起义，鲍格特尼科夫拥护假沙皇季米特里，拉辛打着大权旁落的沙皇阿历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的旗号，普加乔夫以蒙难沙皇彼得三世的形象出现。他们的皇权主义是起义农民用以掩盖对农奴制极端仇恨的外壳。

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其他国家，因而农民的皇权主义也有自己的特点。由于自秦以来，中国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农民与皇帝直接处于对立之中，因而在绝大多数场合，农民领袖并不假借封建帝王的名号，而是自己称王称帝。只有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或者民族矛盾尖锐时，才以恢复旧王朝作号召，如新莽末年更始、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sup>②</sup>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0页。